

英國漢學家蘇慧廉與晚清溫州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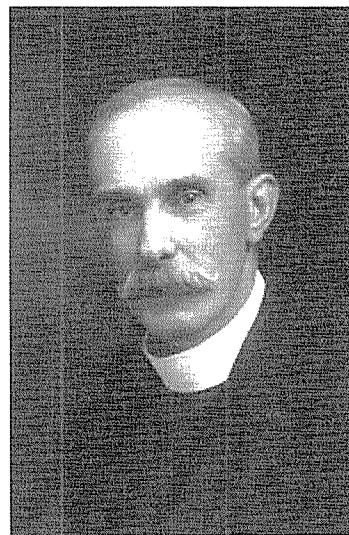
British Sinologist W. E. Soothill and Modern Education in Wenzhou during Late Qing Period

端木敏靜 (Duanmu Minjing) **

一、前言

早在 19 世紀下半葉，英國內地會和英國循道公會¹的傳教士相繼前往浙江溫州傳教，開創了基督教新教在溫州的歷史。爲了使傳教工作更有效地展開，他們興辦新式醫院和學校，爲當時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的晚清溫州走向近代文明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助推作用。尤其是循道公會傳教士蘇慧廉所辦的藝文學堂，開溫州新學之先，對溫州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示範、普及和啓蒙的作用。然而溫州地方史志等關於循道公會在晚清溫州辦教育、醫院等文化活動的歷史資料甚爲匱乏，導致這些學校校史和醫院院史出現不少的錯誤。² 本文作者曾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對其所收藏的循道公會海外傳教士歷史檔案和蘇慧廉個人檔案資料進行調研，同時走訪在英國的蘇慧廉後人，並對他們進行訪談，最後充分挖掘、細緻梳理上述有關蘇慧廉的第一手資料以及國內現有的相關史料，³ 對晚清時期蘇慧廉在溫州的教育文化活動加以詳細闡述。

蘇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 出生在英國約克郡哈利法克城 (Halifax, Yorkshire)，1882 年來溫州傳教，1882 年至 1907 年任循道公會溫州教區



蘇慧廉其人 (W. E. Soothill. 本照片由蘇慧廉後人提供，在此表示感謝)

* 本文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專案「外國收藏 16-20 世紀來華傳教士檔案整理與研究」(編號 09JZD0014) 課題階段性成果；溫州市文化研究工程項目《英國傳教士蘇慧廉研究》(編號 Wyk10123) 階段性成果。

** 作者爲溫州大學城市學院講師。

1 當時在溫州傳教的是英國循道會的分支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857 年)，根據《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 1901-1902》時稱聖道公會，也有稱「偕我會」，1934 年又併入循道公會。

2 例如〈近代西方醫學對溫州醫學發展的影響與啓示〉，《中國高等醫學教育》2009 年第 9 期，有關溫州循道公會醫院歷史的紀錄出現多處人名和歷史事實的錯誤。

3 本文的歷史資料多數來自英國循道會差會會刊 *The Missionary Echo of the United Free Methodist Church*，本刊創於 1874 年，主要刊載循道會傳教士在世界各地的傳教情況，經常刊載傳教士們給差會的信件和報告。同時收藏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檔案館的蘇慧廉檔案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史料來源。

長。1907年至1911年任山西大學堂⁴西齋總教習，亦即校長，任滿後於1912年曾聯手牛津大學副校長、劍橋大學副校長、倫敦大學校長等英國教育界著名人士、資深教授，積極籌建聯合各教派的「中國基督教大學」(China Christian University/the Central University)，學校選址漢口。⁵而且該籌備委員會因蘇慧廉在中國教育工作出色，一致推選其為校長，該計畫後因第一世界大戰爆發被迫擱置。1914年蘇慧廉在牛津大學獲得文科碩士學位。⁶1914-1918年起在倫敦任歐洲基督教青年會(Y.M.C.A)宗教工作主任幹事。⁷1920年至1935年任英國牛津大學漢學教授，是繼理雅各後牛津大學的第二位漢學教授。其後於1926年至1927年間被英國政府派為英中庚款委員會委員，⁸該委員會中方成員包括胡適、中國著名鐵路專家、當時政界名人王景春和中國地質事業創始人丁文江，並且因此與胡適有交往。1928年蘇慧廉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作為英國知名的漢學家、「中國通」，他的漢學著作頗豐：曾編撰《中國佛教術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又將他在牛津大學的講稿整理，出版了《中國的三大宗教》、《中國與英國》、《中國與西方》等書。他還翻譯了《論語》(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7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世界經典叢書」收錄了蘇慧廉翻譯的《論語》，並且還將《新約聖經》翻譯成溫州方言，該方言版聖經現被大英圖書館收藏。除以上著作以外，蘇氏還將自己在溫州傳教工作以自傳形式寫成專著 *A Mission in China*，並為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專門寫了傳記。

蘇慧廉自1882年始在溫州生活、工作了26年，期間蘇氏對溫州的宗教、文化、醫療等領域都有頗深的影

響，尤其對溫州的近代教育做出的貢獻可以說是功不可沒：他於1887年創立藝文小學，1897年開辦藝文中學。藝文學堂至1928年停辦為止，二十餘年來為溫州培養學生千餘人，溫州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民國教育家劉廷芳，溫州婦產科創始人、浙南名醫陳梅豪，甌海公學創辦人谷寅侯等均為該校早期畢業生。藝文校史雖短，實開溫州新學之先，為近代溫州培養了一批新式人才。他在百年前拍攝的多幀溫州照片，成為迄今為止所能找到的有關溫州舊城舊貌最久遠的實地記載。他在百年前設計主持建造的城西禮拜堂，至今依存。這幢哥德式建築風格的教堂，是溫州地區歷史上規模最為宏偉的基督教堂，現為中國省級重點保護單位。而今天的溫州墨池小學、⁹溫州第二人民醫院¹⁰的校史或院史館裡，仍記載並傳頌著他的名字。對於這麼一位基督教在華傳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人物，國內外學術界對其深入系統的研究不多，溫州地方史志對蘇慧廉的記載也只有寥寥數語。因此本文通過對蘇慧廉在晚清溫州的教育文化活動的研究，希望引發更多學者的研究興趣。

二、蘇慧廉在溫州的教育活動

從鴉片戰爭開始，近代中國遭遇到了一連串來自西方的日益嚴重的衝擊。在來自西方的現代文明的衝擊與裹挾之下，晚清中國開始了艱難而痛苦的現代轉型歷程。轉型的痛苦不僅在於自視為天下中心的帝國淪落到要靠出賣主權方能求得安寧的地步，而且在於國人敝帚自珍的儒家綱常倫教在與泰西「奇技淫巧」的較量中不

4 山西大學堂於1902年由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利用庚款建立，分中西學專齋，時與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齊名。民國元年收回國有，取消中西兩齋，校名為「山西大學」，1943年6月改為「國立山西大學」。

5 *Missionary Echo*, Vol. XIX (London: Fre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1912), pp. 49-52.

6 *Missionary Echo*, Vol. XXI (1914), pp. 73-74.

7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4 (Oct., 1935), pp. 783-785.

8 本文作者在牛津大學中文系圖書館發現當年中英庚款委員會委員的合影，照片上面附有清晰的人員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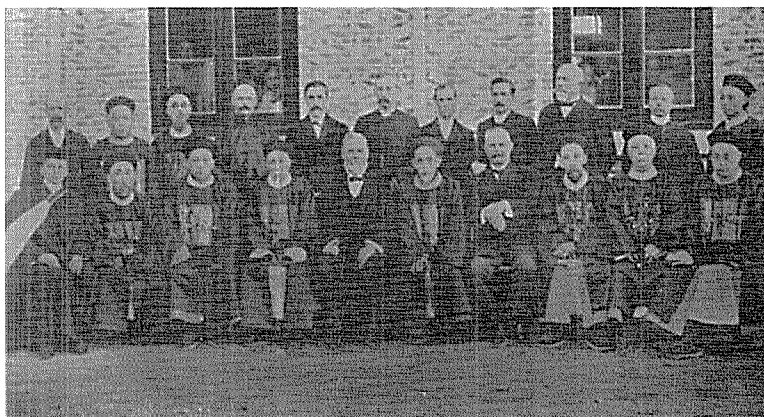
9 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藝文小學，1961年7月改名為溫州市墨池小學。

10 溫州第二人民醫院前身是蘇慧廉創辦的白累德醫院，1953年被政府接管。

堪一擊，封建教育、科舉制度的弊端日益凸現。甲午之戰，中國再次慘敗，「外患之刺激既盛，內情之憤懣更深」，¹¹ 國內要求改革教育以興國的呼聲日益強烈。在晚清教育變革的艱難歷程裡，起了啓迪、引導和示範作用的正是率先倡辦西學的西方傳教士，他們為中國教育近代化和培養新式人才與廣開民智做出的貢獻，已是歷史公認的事實。這些致力於教育的傳教士們大多通曉中西，其中不少的傳教士自身在西方受過高等教育，有新的辦學思想和豐富的辦學實踐；他們開辦的教會學校最先使用了具有近代意義的西方學校組織、教學內容和方法，而這些優勢是當時晚清的教育人士們難以企及的，也正是這些優勢使他們在晚清中國的教育改革中得以有所作為。「當時，人們普遍對古老帝國的心有不滿，同時又只能心有不甘地向宣教士求助。」¹² 蘇慧廉在其傳記裡曾如此描述當時溫州人們對教育改革的渴求和對西方傳教士協助的複雜情緒。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及其宗教使命感的驅使下，蘇慧廉開始了他在溫州的教育活動。

（一）蘇慧廉創辦的藝文學堂

早在東晉年間溫州已設有永嘉郡學，及至明清溫州各縣書院林立，學塾普遍，然而這些教學機構皆以八股時文為內容、以科舉入仕為目標，直至 19 世紀末適應時代變化的新式學堂還未出現。甲午戰爭後，著名經學大師孫詒讓痛感國家日益衰敗，懷著「自強之願，莫先於興學」的信念，絕意仕途，居家辦學。據孫詒讓的《溫州辦學記》，1896 年他在溫州瑞安開辦學計館以教算術，方言館以教英文。此類新式學堂是學西學、學實學的專門學校，但是師資多為當地儒生，對西學並不知曉。1902 年學計館和方言館合併為瑞安學堂，程度約在中學



藝文學堂 1903 年新校舍開學典禮上出席人員合影。本照片載於 1903 年《教務雜誌》。Missionary Echo 1904 年 Vol.II 第 35 頁上登有相同照片並附上與會人員說明：後排左六為蘇慧廉，前排左一為蔡博敏校長，前排左五是李提摩太，前排右五溫處道台童兆蓉，前排右四溫州海關署總稅務司史納機先生 J. F. Schoenicke。

和高等小學之間。「而後各縣如平陽、樂清皆次第舉辦，但是學制章程尚未明確，各處學堂辦法參差不齊，辦學水準遠不及瑞安學堂。」同年，溫州府屬中山書院改為溫州府學堂，當時府學堂「自中學及至初級小學三者並為一堂，尤為錯雜。」這是「溫州最早的一所普通中學堂」。¹³ 由此可見，在 1902 年之前溫州還沒有一所高於小學水準、真實意義上有傳授現代西學知識和現代學校組織結構的綜合性中學，而蘇慧廉於 1898 年就開辦藝文中學堂，其創辦的中學在溫州近代教育史上可以說是開新之舉。

1. 藝文小學

光緒十三年（1887）蘇慧廉在溫州康樂坊一處賃房，招收初入學兒童，聘請啓蒙老師，開辦教讀四書和聖經的私塾，這是他後來創辦的藝文小學的前身。「20 多年來，我們小學平均每屆只有 30 個學生，但在中學堂開辦一年後，人數猛增到一百多。公立小學也在興辦，但我們小學在山遜縵先生¹⁴ 的監督指導下，人數已經超

11 孫詒讓，《溫州辦學記》，陳憲文編，《溫州文史資料》第 5 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 435。

12 W. 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7), p. 189.

13 同註 11，頁 435-436。

14 山遜縵（A. H. Sharman），英國循道公會傳教士，1899 年被派來溫協助蘇慧廉傳教和辦學，1902 年擔任藝文小學校長。

過 300 人，即便不算全省最大，也是溫州地區最大的小學。」¹⁵

1907 年爲了吸引更多的學生，藝文小學還增設基礎科學課程，此舉果然奏效，藝文小學成了當地諸多家庭子女入學的首選。¹⁶ 學生有來自信徒的家庭，更多來自溫州地區家境不錯的家庭，還包括不少士紳階層的家庭。¹⁷

1949 年政府接管藝文小學，1951 年更名為「墨池小學」。如今的溫州市墨池小學作爲溫州市最具悠久歷史的小學，是浙江省百年名校。

藝文小學 1902-1906 年學生、教員人數一覽

	學生人數	教員人數
1902 年	25	1
1903 年	100	3
1904 年	240	5
1905 年	280	9
1906 年	334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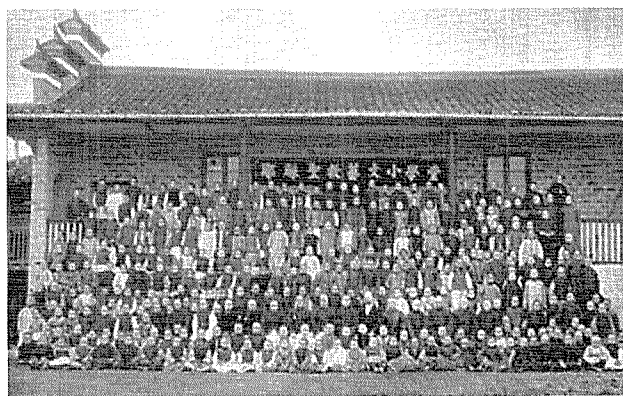
（原載於 *The Missionary Echo of the United Free Methodist Church*, 1907, Vol. II. p.74）

2. 藝文中學

19 世紀 80 年代以降，隨著西學的傳播和洋務運動的發展，蘇慧廉覺察到中國科學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¹⁸「因形勢所需，我們在溫州採取了高中教育的學制」。1898 年蘇慧廉在溫州市的瓦市殿巷租了一座中國式的老房子，開辦藝文中學，¹⁹ 開設講授西學的中學課程。1897 年至 1903 年，傳教士師道培²⁰ 與蔡博敏²¹ 相繼來溫州幫助蘇慧廉發展教育事業。教學工作取得很大的進步，

學生數目也由起先的十幾人增加到一百多人。接著由於學生激增，校舍不足，蘇慧廉妻子蘇路熙回國勸募 800 英鎊，蘇慧廉的一個朋友慷慨解囊捐贈 500 英鎊，1903 年在溫州海坦山麓建教學大樓一幢，校長宿舍一幢。1904 年該校在校生人數就達到 120 人，²² 1906 年學生達到 200 人。²³

1903 年秋，在藝文中學新校舍的開學典禮上，當時的道、鎮、府、縣官員，經學大師孫詒讓、西國通儒李提摩太等達官名儒畢至，孫詒讓還特地帶各學堂的教習和部分學生來參加典禮。蘇慧廉和李提摩太在典禮上演說開學的宗旨，而孫詒讓在演講中說：「現在蘇先生開設之藝文學堂，用西洋文明開發我溫州地方的民智，想見蘇先生要熱心推廣教化，不分中西畛域。力量既大，心思又細，各種教科無不齊全。兄弟登堂瞻禮，如同身到西洋看學堂一樣，心中不勝欣喜。」²⁴ 可見藝文學堂的成立對晚清溫州的新式教育起了示範作用，有著重要的



藝文小學。原載於 W. 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 p.183

15 *A Mission in China*, pp.192-193.

16 *Missionary Echo*, Vol. II (1907), pp. 73-74.

17 *A Mission in China*, p. 193.

18 *Ibid*, p.189.

19 藝文中學堂英文名爲 Wenchow College。

20 師道培 (Wille. R. Stobie)，1897 年來溫州協助蘇慧廉傳教和辦學。

21 蔡博敏 (Thomas. W. Chapman)，作爲教育傳教士於 1902 年來到溫州擔任藝文中學的校長。

22 *Missionary Echo*, Vol. XI(1907), p. 103.

23 *A Mission in China*, p.191.

24 孫詒讓，〈藝文學堂開學典禮演講辭〉，《溫州文史資料》第 5 輯，頁 437-438。

借鑒和參考價值，受到當地政府官員、教育界有識人士的認可和肯定。道、鎮、府、縣之官均到會，藝文學校的社會影響力略見一斑。1903年10月26日的《北華捷報》²⁵對藝文學堂新校舍開學如此報導：「近年發生的諸多大事顯明東方古老帝國正走向新的時代，藝文學堂的開設也是其一。」當時藝文中學的學生大多數來自溫州的中層階層家庭，不少學生來自當地官員的家庭，溫處道台²⁶的侄子也在藝文中學就學。²⁷蘇慧廉曾在1901年3月給母親的家信中提到，溫州當地有一學識的鄉村士大夫特地帶兒子前來拜訪，打算送兒子到藝文中學入學。²⁸

（二）藝文學堂之開新

藝文學堂的創辦實為溫州學界開新，在當時各地大興新式學堂、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歷史時期裡，成為溫州學習西方教育的直接「視窗」，為近代溫州教育先進人士和求學的青少年提供新式教育的榜樣和方法，開闊了教育視野。

1. 新的知識結構

藝文學堂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上顯出有別於當時傳統教育的優勢，增加了西學課程的內容。小學的課程設有中文、數學、歷史、地理和教會學校必修的聖經課，²⁹1903年還增設基礎科學課程，此外，亦為小學生設有一個收費的選修英語課，交費後還能得到藝文中學學生的幫助輔導。藝文中學剛開始因師資不夠，課程設置並不

齊全：1898年開設的課程有英語、中文和數學。1902年隨著新校長和外地聘請的教員陸續到位，課程建設已逐漸完備。³⁰根據海關稅務總司發行的《通商口岸十年期報告之溫州報告》（1902-1911），藝文中學課程包括中文典籍、倫理學、寫作、歷史、數學、自然歷史、化學、基礎物理、英語。英語課程還包括英語文學、語法、口語和實踐課。³¹這些課程涉及了除藝術科目以外所有現代中學教育的科目，而英語課程的設置不僅給學生傳授英語經典作品和語法基礎知識，還強化學生實際運用英語的能力，這種課程設置即使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還是相當科學的。這些課程為學生提供了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術的管道，使他們畢業後在政府應時新設的機構如海關、郵政等就職，或者擔任溫州官員的翻譯。當時溫處道台等官員的翻譯都是聘任藝文中學畢業的學生。³²

1877年在華的西方傳教士成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其主要任務就是為教會學校編譯統一教科書，供初等學校和高等學校使用。它們是中國近代新教育的第一批啟蒙課本。蘇慧廉在傳記裡特別提到，這些教科書的及時出版為藝文中學的創辦提供了條件，藝文學堂的中小學都採用他們的教材。這些新教材為藝文學校的學生提供了學習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管道和載體，有助於他們瞭解西方近代文化，形成新的知識系統，客觀上也為溫州近代社會起了傳播新知識的作用。

此外，藝文中學堂的蔡博敏校長還根據多年教學經驗，於1910年編寫並出版了一本適合高等中學堂使用的英文讀本（*Advanced English Reader*），³³題材豐富，涉

25 《北華捷報》，創刊於1850年，上海第一家英文報刊。1864年定名為 *North China Daily News*，1951年停刊，是舊中國出版時間最長、發行量最大、最有影響的外文報紙。

26 溫處道，清代中國浙江省行政區劃之一。康熙九年，設杭嘉湖、寧紹台、金溜嚴、溫處四道於浙江省內，介於省與州縣之間。行政長官俗稱「道台」，溫處道轄溫州、處州兩府。

27 *Missionary Echo*, Vol. IX, (1902), pp. 126-127.

28 該信由蘇慧廉寫於1901年3月24日，蘇慧廉的家信藏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檔案特藏室，檔案編號：MMS/Special Series/biographical/China FBN 29。

29 *A Mission in China*, pp. 192-193.

30 *Ibid.*, pp. 189-193.

31 *Decennial Reports on Wenchow, 1912-1921* (Shanghai: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23), pp. 122-125.

32 Mrs. Thomas Butler, *Missions as I Saw* (London: Seely, Service & Co. Limited, 1924), p. 116.

33 T. W. Chapman, *The Advanced English Reader*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11).

及英國歷史、文學、哲學和科普知識，皆為英國名家的經典之作。當時兩廣方言館學堂監督陳戡宸³⁴為此書作序，認為此書「淺深難易適合我國高等中學程度」，選材「有益於人，有用於世，有裨於道德，有關於學術，……皆雅正之音」等。³⁵這些評價足見當時溫州教育界人士對藝文學堂的教材在傳播西方知識方面的肯定。

2. 新的教育理念

藝文學堂的新式教育與科舉制度下的傳統教育在本質上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教育的宗旨不同：科舉制度下的私塾教育是培養大小官吏，為君主效力，而蘇慧廉則認為藝文學堂培養學生的目標是「啟蒙心智、強壯體魄和提升道德」，³⁶在他看來，培養一個健全的「人」才是教育的宗旨。這種著眼於教育本質的現代教育理念，對功利主義的科舉教育是個極大的衝擊。其次，藝文學堂以西學為主的課程教育與以經學為主體、重人倫輕物理、重記誦而忽視邏輯思維能力培養的傳統教育相比有很大的先進性，是一種突破性的變革。在藝文學堂裡，學生們再也「不用聲嘶力竭地背誦中國古書了」，³⁷不再像以往的學生那樣終日埋首於儒家經典之中，對科學知識嗤之以鼻。在藝文學堂裡，學生要學習世界史地、物理、化學、數學等課，學習對自然的科學探索，瞭解「蠻夷」西方各國的文明歷史。這些課程的學習不僅有助於學生突破過去封建科舉教育所造成的狹隘保守的思維模式，而且讓學生在更寬廣的視域下對人類社會和自然有新的認識。

1902年藝文學堂校舍在興建時，蘇慧廉特意在教學樓前的空地上圍出一個有四個網球場大小的操場，因為「我們希望中國的『讀書人』一改以往倦怠昏睡的狀態。」³⁸為此，1903年蘇慧廉在藝文學堂開學典禮的演講

中強調「強壯體魄」，發展體質也是該校學生培養的目標之一，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一個嶄新的觀念。因為傳統教育尚文輕武，私塾的教學內容不僅與實用科技知識脫節，而且完全與體育活動無關。藝文學堂還開設體育課程，這對增強學生體質，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此外，蘇慧廉還積極創造機會使該校的學生與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聯誼，³⁹拓寬學生們交際視野，豐富校園生活。同時他也希望借此「對我們男孩子的精神道德產生更深遠的影響。」相比較以往的封閉性強的私塾教育，這些活動給晚清溫州學子的文化生活帶來了突破：學生開始與其他各地學校、社會有了溝通，接觸更多新思想、新觀念、新的生活方式，師生關係亦師亦友。在晚清的溫州，這所新式學堂提供的不僅是新的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成為一種社會公共文化空間，成為傳播新觀念、變化人們思想的地方。

3. 新式教師

中國晚清維新時期掀起了興辦新式學堂的高潮，這使近代教育建構過程中一直存在的師資缺乏問題更顯突出，尤其缺乏具有新的教育理念和新的知識結構、對現代教育有一定體驗的教師。在溫州，孫詒讓等創辦的新學堂就碰到類似難題：學堂的西學課程，一般需要重金聘請外籍教習，或是聘用教會學校的畢業生任教。溫州地處僻壤，交通不便，外地人均不願應聘，因而大多仍為本地的塾師、儒生，他們對西學一無所知，教學方法也因循守舊。而藝文學堂在這方面顯出很大的優勢。

1899年，山遜縵牧師（A. H. Sharman）被派來協助蘇慧廉傳教和辦學，同時擔任藝文小學校長。作為在英國被按立的神職人員，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而且山

34 陳戡宸，溫州里安人。光緒29年進士，戶部主事。歷任浙江諮議局議長、兩廣方言學堂監督、北京大學堂講席。

35 T. W. Chapman, *The Advanced English Reader*, pp. 5-6.

36 1903年藝文學堂新校舍開學典禮上，蘇慧廉在演講中提及藝文學堂培養學生的目標。*Missionary Echo*, Vol. X (1903), p. 68.

37 *A Mission in China*, p. 191.

38 *Missionary Echo*, Vol. X, 1903, p. 68.

39 *A Mission in China*, p. 191.

邇漫喜歡遊歷各地，早在 16 歲就開始周遊亞洲、非洲各地。⁴⁰ 山牧師豐富的閱歷和對各地風土人情的瞭解能開闊學生的眼界，給予他們全新的視野。1898 年傳教士師道培負責藝文中學的教學等事務。師道培畢業於愛丁堡大學，而且在英國當小學校長已有多年，這些教育背景和教學管理實踐是藝文中學順利開設的重要保障之一。⁴¹ 1902 年，理科碩士蔡博敏先生加入蘇慧廉的團隊，出任藝文中學的校長。具有碩士學位和歐美高等教育背景的專業人員來出任校長，這在當時的溫州教育界實屬罕見。同時他的學科特長，可以負責學校的理科課程教學。更為重要的是這位蔡博敏校長來溫州擔任藝文學校校長之前，已在英國里茲一所中學擔任校長已經多年，有著豐富的教學和管理經驗。⁴² 蔡校長不負眾望，工作出色，改革課程，實行分科教學。同時為了該校能儘快自立，積極培訓他的同事。此外，蘇慧廉還成功地從登州文會館⁴³ 聘請了一位具有大學文憑的數學教師在藝文學堂就職。這位數學老師在做好本職工作之餘，亦在本地培養新人，使之有能力來負責學校的數學教學。⁴⁴ 根據《通商口岸十年期報告之溫州報告》提到：「藝文學堂有一位外國人校長和 10 位中國教師，每位教師都有各自的專業特長。」1912-1921 年期間的報告如此說：「除了外國人校長以外，還有 14 位中國教師，每個教師都能勝任一門或一門以上的科目教學。」比起那些只受過中國傳統教育、知識結構單一的私塾教師來，這些受過現代教育、有一定專業特長的新式老師更能適應當時人們學習西學的要求，他們的教育推動了西方科學和人文知識在晚清溫州的傳播。

這些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經歷的新式老師，不僅是新學知識的傳授者，而且還是新式人才和新式教師的培養

者、示範者。如藝文學堂畢業生、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的劉廷芳曾是蔡博敏的得力助手，協助英語教學。⁴⁵ 劉廷芳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國立北京大學任教多年，也是離不開他早期在藝文學堂所接受的教育和培養。藝文學堂畢業的優秀學生也有留校執教。當年溫州著名的甌海公學校長谷寅侯也是藝文學堂畢業生，還曾留校當藝文學堂的教員。根據《溫州教育志》關於溫州近代教育史上重要人物的章節裡，筆者發現其中創辦各類學校的 10 位校長中，有 4 位都是畢業於藝文學堂或者曾在藝文學堂教學。⁴⁶

4. 新學與舊學的結合

蘇慧廉在引進西學的同時，也注重對中國傳統教育的吸收和融合。當時人們對西學熱情高漲，甚至視西學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唯一出路，而蘇氏卻頗有些遠見地意識到學生學習傳承自己本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剛開始因為人手不足，及當時溫州社會傳統觀念的限制，蘇慧廉採用中國私塾的教育，除了《聖經》的學習以外，儒家經典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內容。即使在後來藝文學堂大量增加西學內容的時候，蘇慧廉仍是主張中西學兼通，並不是全盤用西方教育來代替中國的傳統儒家教育。他認為：「對教會學校而言，讓學生學好了別的知識而對自己的語言一無所知是不可取的。」⁴⁷ 因此中國古典經籍在藝文中學的教學大綱裡佔據主要位置。不僅如此，蘇慧廉還決意聘請當地一流的老師教授中文，並且成功地找到了溫州最博學的學者之一——湯聯奎來教授儒家經典。這種對學生的母語學習和本國文化傳承的重視，即便在今天也有現實教育意義。藝文學堂的名字就是取自《周禮》中「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中的

40 *Missionary Echo*, Vol. I (1906), pp. 177-179.

41 *Missionary Echo*, Vol. XI (1905), pp. 9-11.

42 *Missionary Echo*, Vol. XI (1904), pp. 39-40.

43 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創辦的登州文會館已於 1882 年擴建為大學，他們的畢業生大多數在國家重要機關和學校工作。

44 *A Mission in China*, p. 191.

45 *The Advanced English Reader*, p. 6.

46 李芳華，《溫州市教育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595。

47 *A Mission in China*, p. 192.

「六藝」。⁴⁸ 這些都足見蘇慧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尊重。

在一定程度上，蘇氏超越了民族文化本位的觀念，不受當時許多西方人所持的歐洲文化中心論的束縛，這種客觀的態度在當時西方文化呈強勢推廣的處境下是難能可貴的。事實上，蘇慧廉早在溫州傳教時已經著手翻譯《論語》，並且在其傳記裡對孔子言論及儒教作概述後，他總結說：「此書只能給儒學一個簡單介紹，但這些概述已經表明中國對宇宙奧秘的思索已有深度，而且這深度足以與古代西方哲學家相媲美。」⁴⁹

藝文學堂至 1928 年停辦為止，三十多年來為溫州培養學生千餘人，辦學卓有成效。溫州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如孫詒讓、陳獻宸都對藝文學堂有積極評價：「蔡君（蔡博敏）主講我甌藝文學堂數年，於茲所造翻譯人才，頗不乏人。」⁵⁰ 據蘇的傳記，學生的考試成績超過了當時的公立學校，有些學生還考進了國立北京大學。⁵¹ 不少學生畢業後都從事社會影響力較大而收入頗豐的工作，「有當校長的，也有就職於海關和郵政部門的」。《通商口岸十年期報告之溫州報告》如此評論該校的社會影響力：「這學校獲得相當矚目的成功，該校大多數的畢業生現在全國都擔任重要又受人尊重的職位。」優秀的畢業生如民國教育家劉廷芳、浙南名醫陳梅豪、甌海公學創辦人谷寅侯等，他們後來都成為自己所服務領域的精英，承擔起社會與時代賦予的使命，成為當時社會改革與時代進步的主力軍。如劉廷芳於 1920 前往燕京大學與當時燕大的校長司徒雷登聯手整頓校務，學校氣象為之一新，燕京大學規模由此而奠定。

藝文學堂的出現在客觀上加速了西學在溫州的傳播進程，拓寬了溫州學界辦教育的視野，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新舊教育體制的代謝，促進了溫州近代教育的形成。可以說，藝文學堂在客觀上促進了溫州近代科學知

識的傳播、促進了近代溫州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學制的形成，為近代溫州培養了一批新式人才，對近代溫州知識分子群體的崛起不無影響。

（三）藝文女學

蘇慧廉的妻子蘇路熙也在蘇慧廉的影響和勸說下開始在溫州創辦女校，⁵² 並且在破除裹腳惡習、爭取婦女權利等方面亦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1904 年蘇路熙在溫州市康樂坊天燈巷內英國人的住宅裡騰出一間房子，辦了藝文女學，是繼英國內地會傳教士曹雅直夫婦在溫州創辦育德女學之後第二所女子學校。學校學習的課程包括《聖經》、漢字讀寫、簡單的數學知識、音樂和女紅。此外，這些女生還學習蘇慧廉創立的溫州方言拉丁文拼音文字，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可以「讓那些沒念過書的女孩們能容易學會讀和寫，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意思。」⁵³

學校免除任何學雜及午餐費，但是入學條件就是在校女學生不能纏足。雖然傳統觀念一直掣肘著放足運動，甚至有些女生白天放足後回去又重新纏足，蘇路熙仍是執意堅持，每日早晨對到校的學生檢查，一發現有纏足就沒收纏足的腳紗。教會女校對女生的放足實踐，在當時溫州社會上具有率先垂範的積極意義，也喚醒了溫州女性追求幸福和個性解放、擺脫封建束縛的意識。蘇路熙曾在她的傳記裡如此描述這批放足的新女性享受天足的快樂：

下午課程結束後，若是晴天，女孩們就受邀到教室旁的草地上玩。她們盡情地玩各種遊戲。有時你會看見她們在我身邊嬉戲奔跑，有時她們在使出渾身力氣拔河，看到她們在草坪上笑得前仰後翻，你會由衷地感到天足的美麗和寶貴，我想這些女孩們此刻也意識到了。⁵⁴

48 *Missionary Echo*, Vol. I (1906), p. 179.

49 *A Mission in China*, p. 253.

50 *The Advanced English Reader*, p. 6.

51 *A Mission in China*, p. 191.

52 Lucy Soothill, *A Passport to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31), p. 214.

53 *Ibid.*, p. 238.

54 *Ibid.*, p. 250.

(四) 西學傳播活動

蘇慧廉雖身處偏僻的溫州，但一直與當時在中國從事教育事業、文字出版事業的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傅蘭雅等保持友誼、聯繫，⁵⁵ 關注著中國的教會教育事業的發展動態與西學傳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蘇慧廉除了致力於在平民百姓中傳揚基督教，還注重與溫州當地官紳人員的交往，努力克服彼此間的偏見，取得他們的信任。改善關係的突破口在於蘇慧廉所具的西方文化身分，以及他所提供的西學書籍。在 1897 年蘇慧廉給英國母會的報告中提到：「如今我們在溫州的士大夫階層中開始有了突破。贏得這一階層人士將會大大推動上帝的道在中國的進程，因為正是這些人士深深影響著中國成千上萬的百姓。我贈送給他們一百多本的最好的西方書籍，慢慢地已經獲得他們的信任。他們中間有十幾個人與我們保持聯繫交往。」⁵⁶ 當時這些西學書籍主要來自廣學會編譯出版的書籍，它們曾在近代西學東漸和維新思想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晚清的社會變革產生重要影響。

蘇慧廉不僅向上層士紳人士贈送西學書籍，他還努力加強西學在普通人士中的影響。早在 19 世紀末蘇慧廉就設想在溫州開設書店，1902 年蘇氏與廣學會（當時李提摩太任廣學會總幹事）協議，出售廣學會出版的有關自然科學、西方文化制度等的書籍，書店就設在教堂裡面。⁵⁷ 蘇慧廉在 1902 年 6 月 22 日給他母親的信中提到新開的書店很是歡欣鼓舞：「我們的書店存有價值 850 銀元的書籍，都是些通識性書籍。生意不錯！書全部售完，我們還要進新書呢！」⁵⁸ 可見在當時溫州西學書籍匱乏的情況下，蘇慧廉引介的西學書籍深受士紳和普通士人的歡迎。這些書籍為晚清溫州的士大夫階層接觸西學和瞭解西方文化提供了一個視窗，在傳播新知、開通風氣、轉變觀念方面發揮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三、結語

蘇慧廉所辦的藝文中學，實開溫州新學之先，在近代溫州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也是溫州近代文化交流史一件令人矚目的事件。雖然他沒有直接參與具體的教學活動，但是作為藝文學堂的主要創始人，他為藝文學堂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正是他敏銳地察覺到中國教育制度將有變革，在 1898 年創立了適應時代需要的溫州第一所普通中學；也是他看到教會教育事業需要正規化、專業化的發展，因而一再向英國母會請求派遣專業教育人士來溫執教；⁵⁹ 也正是蘇慧廉夫婦多方演說努力，在 1902 年順利為藝文學校新校舍的建設籌款 800 英鎊，為學校建設提供物質保障。這些都顯示了蘇慧廉作為教育家的良好潛質：善於發現新情況、新趨勢，善於捕捉新機遇，採取新措施，能夠把握時代脈動，順應時代潮流，並且敢於領時代之先。為了對蘇氏所作的種種努力表示感謝，藝文學堂的全體教員曾贈予蘇氏藝文學堂的銀製模型。筆者在英國訪問蘇慧廉後人時，他們特意展示了此模型的照片。

回國後任牛津大學中文教授的蘇慧廉，致力於中國文化的介紹，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實際貢獻。先後出版了《中國與西方》等書介紹中國宗教、歷史和文化的著作。雖然當時已有著名漢學家理雅各《論語》的譯本在先，蘇慧廉還是著手翻譯《論語》，因他發現理雅各的譯本有其卓越之處，但學究氣過重，非普通讀者能理解。為了普及中國儒家經典，他覺得有必要為讀者提供一個嶄新的譯本，這是他翻譯《論語》的初衷，也是他希望東西方文化在哲學思想層面進行交流的迫切願望的流露。1937 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世界經典叢書」，收錄了蘇慧廉翻譯的《論語》，亦是學術界對蘇慧廉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出貢獻的認可。

55 *A Mission in China*, p. 109.

56 *Missionary Echo*, Vol. IV (1897), pp. 55-56.

57 *Missionary Echo*, Vol. IX (1902), p. 83.

58 該信由蘇慧廉寫於 1902 年 6 月 22 日，蘇慧廉的家信藏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檔案編號：MMS/Special Series/biographical/China FBN 29。

59 *Missionary Echo*, Vol. XI (1904), p. 36.